

全球“猎身”

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

项飏 著 王迪 译

本书的英文版 *Global Body Shopping*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获由美国人类学会, 城市、国家和跨国 / 全球人类学团体颁发的 2008 年度安冬尼·里兹奖。



全球“猎身”

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

项飏 / 著 王迪 /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 / 项飏著 ; 王迪译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1

(走进世界·海外民族志大系)

ISBN 978-7-301-18244-4

I. ①全… II. ①项… ②王… III. ①信息技术—高技术产业—劳动力资源—研究—世界 IV. ① F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6557 号

书 名：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

著作责任者：项 飏 著 王 迪 译

责任编辑：丁 超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8244-4/C·0638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信箱：pw@pup.pku.edu.cn

封面设计：点石坊

印 刷 者：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17.5 印张 250 千字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6.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以全球社会为研究对象 推动社会科学更加繁荣

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如何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是社会科学界要致力研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大，与其他国家的接触和交流日益增多，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也迈入了新的阶段，即加强对全球社会的经验研究，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侧重于国内社会的实践研究，对国外的研究偏重于理论介绍，而经验研究相对缺乏，这样可能出现的后果是国内外的理论家由于缺乏可供讨论的共同的实践经验，因而对双方理论的理解难以深入，容易陷入彼此自说自话的状态。当今天我国的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国际影响力逐渐增强，同时，我们的研究者也能对自己的研究充满自信的时候，那么，走出国门进行外国社会的经验研究就具备了比较成熟的条件。

推动以全球社会为对象的经验研究，是中华民族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为实现伟大复兴而赋予我国社会科学界的使命，是我们制定科学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前提条件，也是我们促进国际社会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方向发展的可能契机，同时也是我们开展区域合作，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国际环境的基石。

推动以全球社会为对象的经验研究，是我国在全球化的背景中日益迫切的知识需求。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方向的发展，“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社会科学对于海外社会研究的匮乏，我国社会层面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还停留在

集体想象和个人的经验之上，因此以参与观察为基础的关于国外真实而复杂的社会知识，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水平，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繁荣，也有利于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局面的良好发展。从社会科学发展的角度来思考，这也是实现我国社会科学同国外社会科学平等对话的前提条件，有助于我国社会科学朝着更加全面先进的方向发展。

以全球社会为对象的经验研究是一项光荣而非常艰巨的工作，同时，它涉及到全球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以及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内容，这也就对此项工作的开展提出了更多、更苛刻的要求，它不仅要求我们掌握当地语言、实现多学科联合作业，而且还必须具备从事实地调查研究的诸多客观条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此项工作的开展的确存在着诸多困难。比如，从事海外田野作业的经费短缺；政府外事机构针对我国公民在外国的管理和服务功能尚不健全。令人欣慰的是，上述诸多制约条件在近几年内特别是在党的“十七大”之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一些学术课题的资助有力支持了部分学者到一些国家进行田野作业；党中央、政府鼓励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为有志于此的学者提供了条件；同时，我国的发展水平也造就了民众比较自信和平和的对外心态，奠定了接受充满差异的真实的外部世界的心理基础。我们高兴地看到，我国一些学术机构和学者正在致力于建设面向全球社会的实地研究平台，开创了全球社会经验研究的新局面。正是他们的辛勤付出，为我们真实了解世界开启了一扇更为宽阔的视窗。

我们期待，随着更多的中国学者走进世界，一批又一批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将会诞生。我们相信，中国社会科学将会因此进入一个更加繁荣的新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副部长 郝平

2010年6月15日端午节

凝视世界的意志与学术行动^[1]

能叙事才好成事。是表述主体才可能是社会主体。

“到海外去！”

“到民间去”，曾经是一个世纪前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发生期所酝酿出来的口号。先有具备学术规范的社会调查，才有社会科学的出现。在少数人一段时间的尝试之后，这句凝结着共同体集体意识的口号成为1919年之后的知识界的运动，在中国促成书斋学问之外的社会调查之风蓬勃兴起。社会科学诸学科此前在中国主要是课堂传授的西方书本知识，“到民间去”的调查之风呼唤着以中国社会为对象的知识生产，这种知识生产逐渐造就了中国社会科学诸学科。

今日的中国社会科学界则萌发着另一种冲动，一种积聚了很久、压抑了很久的求知之志，这就是：“到海外去！”

曾经，在大家都不能出国的时期，我们在政治关怀上满怀豪情地、当然只是浪漫地“放眼世界”。今天，出国旅行在中国已经大众化了，“看世界”的欲望已如春潮涌动。中国的知识界要做的是以规范的学术方式“走进世界”之后“凝视世界”！

关于社会调查，关于经验研究，“到海外去”预示着中国社会科学发

[1] 本序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人类学专业海外民族志项目负责人高丙中。

展的新机会。社会调查的眼界有多宽，社会科学的格局才可能有多大。几辈知识分子在“民间”、在本土开展调查研究，奠定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当下格局。我们今天到海外去，到异国他乡去认识世界，则是为了中国社会科学明天的新格局。

到海外做民族志

中国人出国，在“镀金”、“淘金”、“挥金”之外，新增加了一个目标，这就是扎在一个地方把它作为一种社会、一种文化来观察，然后写出学理支撑的报告，名之曰“海外民族志”。虽然到目前只有十多个人怀抱着这个目标走出国门，但是它的学术和社会意义却不同凡响。

海外民族志，是指一国的人类学学子到国外（境外）的具体社区进行长期的实地调查而撰写的研究报告。这种实地调查应该符合人类学田野作业的规范，需要以参与观察为主，需要采用当地人的语言进行交流，并且需要持续至少一年的时期。

在西方人类学的正统和常识中，民族志就是基于异国田野作业的研究报告，“海外”是民族志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它们是没有“海外民族志”这个说法的。

人类学民族志的标杆是由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玛格丽特·米德那批充满学术激情的青年才俊在1920年代出版的著作所树立起来的。他们各自从伦敦，从纽约背起行囊，乘船出海，到大洋中的小岛和“野蛮人”长期生活在一起，完成了《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安达曼岛人》及《萨摩亚人的成年》等经典的民族志著作。他们是第一批靠民族志成为人类学家并进而成为学术领袖的人物。他们的职业生涯成为人类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的模式。做民族志，总要有充沛的激情让自己想得够远，走得够远。在拥有成千上万的人类学从业者的西方国家，即使后来在国内社会做民族志的人逐渐多起来，但是，到海外做民族志还是一直被尊为人类学人才培养的正途。

但是，对于中国的人类学共同体来说，民族志一直都是一种家乡研究，一种对于本乡本土、本族本国的调查报告，因此，“海外”从来都是中国人类学的民族志所缺少的一个要素，所未曾企及的一个视野，所没有发育起来的一种性质，当然也是今天绝对需要的一种格局。

一般都说中国人类学已经有百年的历史，我们现在才有组织地把田野作业推进到海外，这项迟来的事业让我们终于可以跨越百年的遗憾。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厦门大学、云南大学等具有人类学专业的国内高校正陆续把一个一个学子送到海外开展规范的田野作业。

中国学人到海外做民族志的时代尽管迟来却已经大步走来！

作为表述主体的共同体

一个共同体，在关于世界的叙事中所占的位置与它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是关联在一起的。民族志是共同体对共同体的表述地位、能力以及主体性明确程度的知识证明。

学术是用文字表达的抽象观念。文字是个人一段一段书写的，但是抽象观念却不是个人意义上能够成立的。学术是共同体的衍生物、伴随品。——共同体造就学人，共同体产生知识兴趣、共鸣群体（读者），共同体传承学术成果。反过来，学术则催生新的共同体或促成共同体的新生。

具有集体意识的共同体必须是表述者，必须是能够言说自我、言说他人的表述者。民族志是关于共同体表述地位是否存在的证明，是共同体通过特定的表述得以构成或显现为主体的知识途径，是共同体的表述者身份的名片。

虽然民族志的主笔者是个人，虽然民族志的材料来自被访谈的一个人，虽然一部一部的民族志都有各自不同的具体内容，但是在集合起来的总体效用，民族志承载着共同体对共同体的结构性关系。西方与东方的关系、与非洲和拉美的关系，既是由西方所生产的器物所支撑的，

由西方的武器所打出来的,也是由西方关于非西方世界的叙事所建构的。这种结构性关系是难以改变的,但不是不能改变的。改变,只能由器物生产的实力和叙事的表述能力所构成的合力来促成。

在前现代,作为表述者的共同体是各自说话,并且主要是自说自话,偶尔才说及他人,对他人的表述和自我表述都难以直接影响他人社会——即使慢慢偶然传播到他人社会了,影响效果也总是以缓慢而曲折的方式发生。

在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兴起,尤其是民族志的兴起,造成了一种知识后果,这就是群体作为自我与作为他者都被置于同一个表述所组成的社会景观之中,置于西方作为世界中心的这个社会结构之中。从视角来分析这种社会结构的知识关系,西方之所以处于世界的中心是因为几乎所有的观察者、表述者都是从西方往外看的。也就是说,从民族志来分析,作者都是西方学者或者学习西方的学者,而文本内容所叙述的都是非西方社会的事情;在共同体层次,西方是凝视者,非西方是被观察对象。知识的社会后果早就凸显出来:关于他人社会的叙事不仅在不断满足西方大众的猎奇之心,而且在知识和社会观念上不断强化我群与他群的一种中心—边缘的结构关系——如果我群与他群的相互表述是不平等的,这种结构关系也是不平等的;如果相互表述是极端不平等的,那么这种结构关系也是极端不平等的。民族志的作者在自己的社会中不过是一个普通学者,而在共同体的关系中却支撑着其共同体的优越地位。西方作为民族志叙事的主体,同时也成为普遍主义思维模型的创立者,普世价值的申说者、裁判者,世界议题的设置者。

不过,后现代的世界给人类带来了新的机会。这一波来势汹汹的全球化,也是世界各个共同体、各个层次的力量和关系的再结构化机会。意识形态批判使西方中心主义得到深刻反省,新技术、新媒体与人口流动使关于他人的叙述不再能够作为一面之词而成立。更多的共同体能够在国际平台上成为关于世界的叙事者了,世界真正变得紧密了,于是,共同体的代表者对自我的表述与对他人的表述都会同时影响自我

和他人在结构中的位置和关系。共同体在全球社会景观中的位置和关系是由代表者的表述和他们参与的表述的总和所塑造的。

中国学者是一个后来的参与群体。“后来”有遗憾，但是后来者必然有不一样的机会和优势。

民族志与中国社会科学

西方人类学家打造了民族志的镜子，用它来审视非西方社会；我们从西方拿来民族志方法的镜子，几十年来只拿它观照自己。现在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民族志方法其实是一把多面镜，它可以观照我们，其实更方便观照我们之外的世界。

共同体的社会科学是要靠关于社会的叙事来支撑的。支撑西方社会科学的是关于全球范围的社会叙事，而支撑中国社会科学的是限于中国内地的社会叙事。相比较而言，西方社会科学是以西方为中心看世界，而中国社会科学是以西方的学术眼光看中国。西方学者跑遍世界，当然也跑遍了中国各地，撰写了成千上万的民族志，建立了关于世界的叙事；中国学者也出国，当然主要是到西方国家，但是十分耐人寻味的是，他们把西方只是当作一个大学，那里只是求学的知识殿堂，并不是他们做田野调查的地方。他们回国才做调查研究。

中国追求现代化一百多年，几辈学者介绍了几乎所有的现代化国家的思想和理论，但是从来没有为国人提供特定的现代社会在社区层次的实际运作的经验知识。现代社会具体是怎样的？现代生活对于个人如何是可能的？中国的社会科学没有认真提过这种问题，中国的人类学也没有当作使命来回答过这种问题，当然就一直没有相应对象的民族志出现。

毫无疑问，中国的社会科学也是以追求真理、认识人类社会的科学规律来自我期许的。但是，中国在近代以来主要是在政治、军事上纠缠在国际事务之中，在学术上因第一手经验研究的缺乏是处于国际之外的。我们也关心亚非拉人民，也声援发达国家的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帝

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正义事业，不过，这大都是在政治、道义上的努力。在知识产业上，中国的社会科学一直都是一种家庭作坊，是一种自产自销的格局：学者们在自己的社会中发掘经验材料，以国内的政府、同行、大众为诉求对象。一些学科也涉及国际世界，甚至以国际社会为论题，但是基本上都是站在（或藏在）中国社会之中对外人信息间接引用与想象的混合物。没有进入世界的田野作业，没有关于国际社会的民族志作为支撑，何来以现实世界为调查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

中国的社会科学，从关于中国、关注中国社会、关心中国发展的社会科学，到认知全球社会的科学，必须从最基本的海外民族志个案积累开始。中国学界的海外民族志将逐步建构中国对于世界的表述主体，中国将从民族志观察的对象转变为叙述世界的主体。在国际社会科学中，中国从单向地被注视，发展出对世界的注视，以此为基础，作为表征社会知识生产关系之核心的“看”就必须用“注视—对视”（也就是“相视”）的范畴来对待了。获得社会知识的单方面的审视总是被抱怨包含着轻视、敌视，但是“对视”以及作为其产物的相互表述的民族志将在国际社会之间造成“相视而笑”的效果，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期盼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结果。

以中文为母语的人口与中国人口都在世界上占最大的比重。中国学人和中文加入到关于世界的实地调查研究中来，世界社会科学无疑将因之大为改变。更多的参与者、更多的视角看世界，看彼此，被呈现出来的世界将会大不相同。

展望中国社会科学新格局……

因为心中有春天，我们看见嫩芽会欢欣。

海外民族志训练是未来的人类学家出师的汇报演出。没有人指望其中有多少大师的代表作，但是它们无疑都是地区研究的一个区域的开拓性著作，更加确信的是，它们的作者是中国人类学乃至社会科学在国

外社会大展经验研究的开路先锋，是为我们的共同体在知识世界开疆扩土的功臣。它们的作者从熟悉的家园到远方、到异国他乡而去，拓展了中文世界的空间。它们从社会知识生产的源头而来，就像涓涓溪水从雪山而来，假以时日，配以地势，必将汇聚成知识的海洋。

我们年轻的人类学者已经走进世界，在泰国、蒙古、马来西亚、印度、澳大利亚、美国、德国、法国、俄罗斯、巴西、香港、中国台湾等地，深入一个社区进行起码一年的参与式社会调查。他们会带动越来越多的学人参与，世界上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中国学界的关注点。他们陆陆续续地会完成自己的民族志成果，用中文书写当前世界各种社会的文化图像。他们的民族志个案今后可以组合成为对于发达国家的社会研究，对于金砖四国的综合研究，对于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基督教社会的比较研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们特别期盼对于非洲大陆、阿拉伯世界、太平洋众多岛国的研究，特别期盼对于周边国家日本、韩国、缅甸、越南的研究……

海外民族志在中国的广泛开展，将改变中国社会科学单一的学科体制。中国社会科学按照学科划分为政治学、法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人口学、民俗学……分属不同学科的学人要开展合作，并没有学科体制的平台。民族志比较发达的那些知识共同体，如美国、日本，在学科分列的同时还有一个地区研究（area studies）的体制。在学科与地区研究并行的体制中，大学教授分属不同学科的院系，但是相同的地区研究兴趣又把不同院系的教授联结起来。这个方向的发展是以关于国外社会的民族志为基础的，但是却不是人类学家单独能够操作的。我们刚刚开头的海外民族志事业对于中国社会科学派生“地区研究”的机会却是靠整个学界才能够把握的。

海外民族志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领域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在学术上也会更上一层楼。海外民族志除了在共同体层次上、在整体上对于社会科学的重大意义之外，在技术层次、操作层次对于社会科学的影响也会是很实在的。从业者只在中国社会做调查与同时在海外社会做

调查，代表着不同的眼界、不同的事实来源。更开阔的眼界对于议题的选择、对象的甄选、观念的形成都会更胜一筹。学术的精进总伴随着寻找更广泛的社会事实来源；由国际社会经验比较所支持的论说可能更加有力。

相对比较紧迫的是，海外民族志是疗治中国社会科学严重落后于时代的病症的一剂良药。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学者却只在本国的社会中做实地调查。中国把大量资源投入到外语学习上，却没有几个人是计划学了语言去国外社会做调查研究的。中国的商品拥挤在全世界各地，可是它们总是置身在陌生的社会被人用怀疑的眼光打量、挑剔，中国学界没有能够及时为它们创造各个方面都能够熟悉的知识环境。中国大众旅游的洪流已经从国内蔓延到国外，在世界上浮光掠影的观光所型塑的世界观是极其偏颇而危险的。所有这一切都在期待中国社会科学的世界眼光。

凝视世界的欲望需要走出去的意志来展现。人类学者是共同体的眼珠子——它们被用来看世界，看社会，看社会世界，看世界社会。有眼珠子就能够看，有心才能够凝视。人类学者也是知识群体的脚板子——它们要走很远的路，走很多的路，走陌生的路，也就是走没有路的路。有了这样的人类学者群体，一个共同体的社会科学才能走得够远，看得更远。

高丙中

2009年7月4日

序一

寻找一个新世界^[1]

本书的主题是印度的信息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力体系，特别是一个全球化的、号称“猎身”的劳动力调配系统。我的核心问题是：在高新科技产业领域，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高速流转，那么劳动力是怎么被调动、被管理来适应这一状况的？我的研究不关注管理学所关心的问题，我的真正问题是：世界经济中的高度不确定性是如何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思想观念而被构造出来的，这一经济上的不确定性又有什么样的社会后果。因此，我的课题是一个关于全球化的世界的人类学分析。而我之所以要做这个课题，是因为我自己想加入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了解超出我的经验和知识范围的新世界、进而影响世界知识和话语生产和传播的格局。我的研究经历也是一个不断探索世界、和世界对话的过程。在这篇中文序言里，我希望对我们的“世界观”，即我们如何想象世界、特别是如何想象世界和我们（中国）的关系，作一个粗略的历史性的梳理。我本人是“文革”后的产物，在改革过程中和冷战后形成的对世界的想象直接影响了我的研究；而我的研究实践又使得我对这些世界观形成新的反思。序言的第二部分将回顾我个人的“寻找新世界”经历，从而展示，学术活动乃是世界背景下的社会实践，它包含了学理、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之间的复杂关系。

1998年10月1日凌晨，我把关于北京“浙江村”的书稿（《跨越边

[1] 本文中的一些想法得益于与汪晖、杜赞奇等教授的讨论。本文的草稿曾在北京大学“社会学30年”国际研讨会、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以报告形式发表，我感谢对文章提出意见和建议的各国同事。

界的社区》三联书店, 2000。浙江村是在北京一个自发形成的、以经营以服装业为主的流动人口聚居区) 寄给三联书店, 直接赶往机场去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那一刻我已经下了决心: 我的博士项目要不同于我原来做过的题目, 一定要做一项关于非中国的案例的研究。至于具体要做什么样的“非中国”题目, 我一点想法都没有。我所以会有这样的冲动, 并不是因为我想成为一名“正统的”人类学者(即, 根据欧美学界的惯例, 人类学者应该研究与自己不同的“异文化”), 而是和当时我们强烈的国际意识有关。我们意识到, 来自西方的学者们周游世界、互相争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议题, 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者们往往只能当“地方”学者, 要么作为“地方社会”的代表发言, 要么干脆为思考“普遍问题”的世界学者提供原材料。我们挖煤, 别人提炼。更严重的问题是, 我们怎么挖煤、挖什么煤, 以及怎么代表地方社会说话、说什么话, 都自觉不自觉被别人的议题影响甚至决定。很多时候, 中国老百姓不在乎的问题, 只因为符合西方的学术口味, 而在美国被做成大文章。而很多老百姓关心的问题, 则因为套不进流行的框框而被忽略。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中的这一国际劳动分工, 还导致非西方学者的“自我猎奇化”, 为了符合或者为了应对占统治地位的思维, 我们经常故意用煤渣把自己涂黑。像诸多“中国独有”、“中国第一”等声明就是这个“别人出题、我们应答”这一格局下的产物。我当时觉得, 要改变这一状况, 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不能只给西方学者挑错(比如分析欧洲学者对某项中国农村仪式的细节理解有偏差), 而必须跳出自己, 研究世界。只有当我们发展出我们自己的世界视角, 才能作为积极的评论者而成为国际学术共同体的一部分。其他学者, 比如王铭铭教授(2005; 以及一系列讲座, 2006), 特别是北京大学高丙中教授(2006), 不仅阐述了类似观点, 还组织了一系列实际课题, 鼓励年轻学生看世界。

我当时要做非中国的研究, 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 即要通过对非中国的案例的分析, 发掘出中国社会中的“特殊”经验和概念中的普遍意义, 从而把中国经验“提升”到世界范围, 把中国的概念转变成创造新

的世界性普遍理论的一个源泉。受我后来在牛津大学的导师彭柯博士(Frank Pieke)的启发,我当时设想要把“关系”、“背景”等概念看做中国人的民间社会理论而不是特殊的实践;换句话说,作为社会事实的“关系”、“背景”不可能是中国独有(我认为很多研究过分地强调了它们的“中国特色”),真正有特色的是,中国人对这些事实格外敏感,而且发展出一套话语来解释各种社会现象。这种特殊敏感性有可能带来理论创新。要发展这个套路,我应该用中国的民间理论来解释非中国的现象,也用非中国的实践来检验这些中国的理论。

我觉得当时这个想法当然有它合理的地方,但是现在看来,它也有意识和无意识地受到“普遍世界”和“特殊中国”二分的思路的影响。长期以来,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关于规范化和本土化的关系的争论中,我们讲的都是如何把国际理论和中国实践相结合。郑杭生教授(郑杭生、杨敏 2006;亦见郑杭生 2008)最近提出的“两维视野”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概括。他说:“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学理地说,更可体现为一种有方法论意义的视野,这就是两维视野或双侧分析。……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变化包含着两种力量,具有两个维度,这就是第一,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所代表的力量和维度,第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所代表的力量和维度。我们曾经指出,当今世界的每一项重大的动态变化之中,都包含着这两个维度也即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郑杭生、杨敏 2006)于是,世界在上,代表普遍,中国在下,属于特殊。这种二分法,当然不限于社会科学界,它也是整个社会的集体认知的反映。比如,“只有本土化,才能国际化”、“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等口号在文艺界甚至工商界都广泛流行。所以,我当时要做的,不仅是要在横向意义上“跨出”中国,而且要在纵向意义上“攀上”普遍的世界。

总之,当时的冲动是要去“寻找一个新世界”:要了解一个我自己不了解的新世界,更重要的是要寻找一个新的知识生产世界格局。十年后回顾,这个任务既比原来想象的要艰巨,也比原来想象的要简单。比原来想象的要艰巨,是因为通过这十年的摸爬滚打,我更深刻地意识到,

知识生产是和国际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不可能从大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脱离出来，在短期完成根本性的改变。但是比原来想象的要简单，则是因为虽然知识生产的国际格局不能快速改变，我们完全可以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这里的关键是我们自己的“主观世界观”。世界本身是普遍联系的，所以不管我们在低头挖煤、还是仰头放歌，都是世界的一部分。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要有能力对我们自己所在的位置进行反思、批判和提出新的想象，从一个自为的世界进入一个自觉的世界。比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句话本身不一定不对。但是如果我们对究竟何为世界，何为民族作分析，这句话很可能会把我们带进死胡同，使我们失去把“民族”相对化、把“世界”历史化的能力。张艺谋可能是中国当代艺术界最能深谙“越民族越世界”真谛的成功人士。他早期的作品倾向于根据欧美的审美眼光选择所谓“民族要素”来表现中国；而到后来，他更多的根据自己的理解定义何为重要的“民族要素”，把它们强化并展现给世界。比如他对强权的认可甚至崇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对中国“民族”的表现。另外，为了突出“民族要素”，张艺谋的作品往往偏于形式化，追求视觉冲击力。在他手下，很多时候中国人除了上天入地的打闹、奇异极端的习俗，剩下的就只有基本的（有时候是极端化的）七情六欲；而没有自己的历史感、社会感和思考能力。张艺谋的“民族”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的基本经历和问题；张艺谋的“世界”基本上等同于西方电影市场。张的“民族”无疑成功地走向了世界，而他的成功与其说是辅助了中国和世界的沟通，不如说是阻碍了互相的真正理解。所以，究竟什么是世界，这个看似空洞的问题一直是一个不能轻易绕开的问题。我们目前占主流地位的世界观既是在长时段的历史延续中形成的，又是冷战后国内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反映。下面我将分三个历史时期（19世纪末期、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改革时期）来回顾我们世界观的演变。